

字字珠玑呈创意 篇篇锦绣绘文明

——评余意明先生新著《株洲文明史略》

范进军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余意明所著《株洲文明史略》一书,为株洲地域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发现了新史料,提出了新观点,填补了株洲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在语言表达方面,则非常讲究修辞艺术,行文生动活泼。

[关键词]《株洲文明史略》;学术价值;修辞艺术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2-0124-02

Innovation Embodied in Every Word, Civilization Depicted in Every Text

——Review on She Yiming's New Work *A Brief History of Zhuzhou Civilization*

FAN Jinju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he Yiming's new work *A Brief History of Zhuzhou Civilization* opens up a new frontier, discovers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roposes new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f Zhuzhou local culture, which fills up the blank of Zhuzhou local history research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t is vivid and full of rhetoric art in style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Key words: *A Brief History of Zhuzhou Civilization*; academic value; rhetoric art

余意明先生的大作《株洲文明史略》于 2015 年 5 月由岳麓书社出版了。该书的出版,是地方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喜事。之所以说是一件大喜事。一是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株洲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二是该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评价一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无外乎两个视角:一是该书的创意;二是表达创意的文字。前者是体现价值的核心部分。首先看创意。所谓创意,就是该书是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东西。对学术著作来说,这种“新”的东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开辟了新的领域。至今为止,作为湖南东部发达城市的株洲,还“没有一部较完整、系统地反映其历史文明演进和城市变迁的书籍。”^{[1]265}正因为如此,该书的写作难度之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史记·楚世

家》在赞美楚国先王创业艰难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外草莽。”^[2]就说明了开创新的领域的艰难和辛苦。而余先生就是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发掘其中的史料价值,重现株洲这片神奇大地的文明之光。其填补株洲文明史略空白的开创之功,必将为株洲文明的书写和发扬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发现了新史料。为了探明株洲文明史的基本史料,作者“对散佚在二十四史、‘湖湘文库’中涉及株洲历史的内容进行辑录抄写,还阅读了株洲、湘潭、长沙等地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本土民间家谱,然后进行甄别、考证、将株洲历史碎片逐一还原,联缀。因此,本书中相当多的历史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1]265}这个“第一次”就是发现新史料的开创价值。余先生这种从

史料的汪洋大海中发现株洲文明史料的开创之功,不仅为他的大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广大读者更进一步、更清晰地了解株洲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文明进程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三是提出了新的观点。拜读余先生的大著,可谓是字字珠玑,新意迭出。如作者在谈到株洲文明的演变历程时认为“农耕时代的耕读文明”,是“书院、进士构筑儒家主流文化的风景线”;而“广义上的炎帝红色文化则是贯穿到近现代救国救民,反帝反封建为主线的英雄的红色文明”;而“从民国脱胎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则是“繁荣的工业文明”^{[1]2}特别是“地方历史文明发展离不开整体文明,但有时与整体文明演进步调不完全一致”^{[1]266}等新观念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又如确定公元215年为古建宁县设置的具体时间以及“株洲”之名在北宋即已存在等新观点,更是令人击节叹赏。凡之种种新意,奠定了该书学术价值的雄厚基础。四是运用了先进的研究方法。作者在阐述株洲文明史上的社会现象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以及运用新材料来阐明新观点和构建自己的学术框架时,采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明”的思路去进行宏观把握,通过历史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将株洲历史的细节、碎片与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巧妙地结合起来,把株洲文明的演进放在中国、世界的大范围去认识,以株洲五千年的文明演变为经,以株洲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等变化为纬”^{[1]265}去构建全书的框架,使得该书的体系框架,“在编写上没有拘泥于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理论,而是依据株洲地方文明演进的特点去进行,”^{[1]2}这种“大胆创新和突破,”^{[1]2}使得该书在运用恰当的先进的研究方法时,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自成体系”^{[1]2}的独特之处。而这种独特之处,对“我国各地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不无借鉴意义,在地方史研究领域当有一席之地。”^{[1]2}这种独出心裁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该书的学术价值不但具有非常重要的创新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其次看表达创意的文字。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得很久远。所以说,我们说话写文章应该讲究修辞艺术,让文章更加生动活泼,作用也就更大,影响也就更加久远。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曾赞美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形象地说明了《史记》之所以流传千古的原因,就在于《史记》文字的优美动人。拜读余先生的大作,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该书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行文非常讲究修辞艺术和生动活泼。这种语言艺术集中表现在余先生的文字生动优美,叙述层次清楚,议论风趣动人,让人有忍不住一气读完,方能罢手之感。如“屈原是中国人的精神坐标,因为他的诗、他的爱国情怀。汨罗江边那纵身一跃,遭贬的诗人从此在中国人心中画下了一个永远的光弧。”^{[1]16}文章把诗人的身影比喻成一个“永远的光弧”,不但比喻恰当,而且形象感人,读后永远铭刻心中。再看叙述文字:“这年冬天,孙权派诸葛瑾向刘备索还所借之荆州南郡。刘备不答应,采取拖延办法,表示取得凉州后,即还南郡予吴。孙权感觉受骗,大怒,但南郡被关羽镇守,不好动粗,退而求其次,任命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官吏,但随即被镇守江陵的关羽派军驱逐。”^{[1]24}简短的叙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看议论文字,“因慈禧只要大清皇权能保住,江山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反正李鸿章这种臭名昭著的人不至于夺权要命。李鸿章也正是抓住了慈禧的这种心理,从卖国中捞取好处,而且还装出一副‘勇于担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样子。”^{[1]120}风趣动人的议论,把李鸿章大胆卖国而慈禧不予追究而信任有加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凡此种种优美动人之处,不胜枚举。

“字字珠玑呈创意,篇篇锦绣绘文明。”余先生大著正是因为全新的创意和优美动人的文字,使得它在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地方史的学术领域,将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而正是这种历史地位的形成,将为株洲文明史的更深入的研究,奠定扎实而雄厚的学术基础。我想,这应该是该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值得流传永远的亮点。

参考文献:

- [1] 余意明. 株洲文明史略[M]. 长沙:岳麓书社,2015:5.
- [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二十五史全书:第1册[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07.

责任编辑:黄声波